

这次会议也促成了老师与饶宗颐先生的一段诗文因缘。2000年1月2日老师赐下他与饶公唱和诗词与往还书札的复印资料,有的加盖了他自刻的私章与“楚天”闲章,并附一信曰:“齐勇同志:楚简会内外,诸多胜缘。一点花絮,供采摘。”信中讲他自己会中有诗,陈国灿先生陪饶公游黄鹤楼,“引出饶公水龙吟词相和。且不吝泼墨,会后寄来长卷及梅幅;同时澳门教科文中心寄萧请柬一份。书谢之,并FAX去二首贺诗,旋得饶公覆信,并寄赠书澳门展书画册一本。如此文字因缘,可感也。”信中又告吴根友兄1999年12月3日来自哈佛大学的电子邮件称,杜维明教授回哈佛后,盛赞珞珈楚简会云云。

萧老师原诗与饶宗颐先生《水龙吟》,我们已刊登在《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首。老师致饶公书,祝澳门选堂书画展诗幅及饶公答书,都极其典雅,有待公布。饶公、萧公等文人修养,诗情画意,都不是我辈可望其项背的。他们的往还书札也是范本,包括敬词、谦词的运用,书写格式等,都有考究。这就是文人生活中的国学。老师有关书札、诗幅、论著中,有他这个活生生的人,既平实又有追求,其中的真、善、美、圣的意涵,具有永恒的价值,时时捧读,时时受益。

癸巳年头伏与二伏之间

萧蓬父先生与“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

李维武

“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的创立、完善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是与萧蓬父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是这门课开创时期的听课学生,也是以后接着讲授这门课的主讲教师,对于萧先生为开创这门课程所付出的心血有更多一点的感受,因此在这篇短文中结合自己的记忆、听课笔记及萧先生的有关著述,就这一段往事作一些回忆和说明,以此作为对老师90冥诞的纪念。

萧先生开始讲授这门课,是在1981年寒假过后,地点在理学院三楼的一间小教室。当时哲学系办公地点设在理学院,只有党总支和行政两个办公室,各个教研室都没有办公房间,学生上课的教室也大都安排在这里。听讲这门课的学生,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979级硕士研究生。此外,萧先生还通知了两个哲学系本科生前来旁听,一个是1977级的我,另一个是1978级的郭齐勇兄。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萧先生讲授这门课。暑假过后,我们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为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1981级硕士研究生。这样,在1983年寒假过后,我们又作为硕士研究生第二次听萧先生讲授这门课。由于我们这个专业没有1980级硕士研究生,因此这是萧先生第二次讲授这门课。连续两次听过萧先生讲授这门课的学生,大概就是我们两人。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两次听课的笔记。

当时这门课,每周讲授一次,连续四节课,一学期讲完,共计72学时。每次讲授之前,萧先生都以很大精力进行备课,写成详细的讲授提纲。讲课时,他极为用心,十分投入,一边按提纲进行讲解,线索明晰,条理清楚;一边又补充许多内容,间有即兴评价,显示出知识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刻。讲课时,他时而站着,时而坐着,一讲就是半天时间,却始终充满激情。这样一来,使原本很枯燥的哲学史史料的讲解,总是散发出诗意的微笑,表现出哲理的深刻,对听课者产生出很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由于讲授的内容都是同学们并不熟悉的哲学史史料,而当时既没有讲义,更没有教材,因此萧先生讲课时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那些史料的题名与作者,让同学们能够准确地加以记录。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写满了白字,萧先生衣服上也布满了白灰。萧先生长期患哮喘病,在纷飞的粉笔灰刺激下,有时会发出不断的咳嗽声。但这些劳累和不适,都没有影响他讲课的投入与激情。同学们在喜欢这门课的同时,也往往对萧先生的健康状况表示关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谁也没有办法改善这种近乎原始的教学条件。后来我接着讲授这门课时,也经历过这种满身白灰的困境。只有进至21世纪后,武汉大学主要教

室都安装了多媒体教学设备,我自己动手制作了全套教学课件用于讲课,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困境。

萧先生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当然首先在于引导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掌握中国哲学史的相关史料,这是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我的第一次听课笔记中,第一讲《绪论》的开头就记有萧先生的话:“从最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性。轻视史料、臆造规律是错误的。”而更深入一层看,萧先生开设这门课的目的,还在于引导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和继承中国文化史上保存史料和整理古籍的两个传统。对于这一层目的,他在第二次讲课时作了重点说明。在我的第二次听课笔记中,《引言》部分所记萧先生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解就达4页多纸,可见老师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今天看来,萧先生讲的这两层目的实是相联系的:如果说强调从最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继承中华民族保存史料和整理古籍的优秀文化传统,重视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研究,则成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坚持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萧先生之前,已有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萧先生作为他们的学生,在开设这门课的过程中,既十分重视吸取老师的已有成果,又力图形成自己的新意与特色。正是这样,他为之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不仅对中国历代的哲学史料进行了广泛研究,而且对有关本课程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理论思考方面所下的艰苦功夫,可以从我的两次听课笔记中看得出来。比较两次听课笔记,可以看到萧先生的两次讲课并非前后重复,而是出现了很大变化。我感到有两个变化对于这门课的建设尤为重要。

一是课程名称的变化。第一次听课笔记上的课程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二次听课笔记上的课程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程名称的改变,并非萧先生追求标新立异所致,而是他对课程性质深入思考的结果。在第二次听课笔记中,《引论》的开头即记有萧先生关于课程名称的“正名”。萧先生说,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本课程名称不当,因为“这是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具体地说,“本课程类似过去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之综合”。因此,这门课在于“序列文献目录,考辨学术源流”,但由于这方面内容太多,不能都讲,只举其要,所以名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这就最终确定了这门课的名称,至今这个课程名称已沿用了30年。后来,萧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教材中,又对课程名称做了更确切的规定,指出:“本课不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名,而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其内容主要是:以中国历代哲学思想资料及有关史料为对象,序列文献,综述目录,介绍研究成果,考辨学术源流,近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史源学之综合,系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①在这里,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之后,又增补了“史源学”,从而使这门课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全面。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是萧先生十分推崇的;回忆陈垣先生治学生涯的文集《励耘书屋问学记》,也是萧先生向我们反复推荐的必读书。

二是课程内容的变化。第一次听课笔记共记有9讲:一、绪论;二、清代朴学简介;三、先秦史料源流举要;四、秦汉时期哲学史史料;五、三国两晋南北朝哲学史史料;六、隋唐哲学史史料;七、宋元明哲学史史料;八、明清之际哲学史史料;九、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战线。第二次听课笔记共记有引言和8讲:一、朴学简介;二、古史祛疑;三、先秦哲学文献;四、秦汉至南北朝哲学史料;五、隋唐五代哲学史料;六、宋元明哲学史料;七、明清之际哲学史料;八、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战线。两次听课笔记相比较,可以清楚看到萧先生在第二次讲课时增加了《古史祛疑》一讲,并将其放在第一讲《朴学简介》之后作为第二讲,显示出这一讲的重要性。根据第二次听课笔记的记录,这一讲中第一节的标题是《在古代研究中面临着扬弃泥古派和疑古派的双重任务》,萧先生在该节开头即提出:“从泥古到疑古再到科学的释古,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这里“科学的释古”一词,为了避免引起歧义,萧先生在讲解时有过解释,是指通过科学的考古“恢复古代原貌”。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了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奠基者所开辟的“释古的道路”。后来,萧先生将《古史祛疑》这一讲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形成一篇阐述他中国古史观的代表性论文,收入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吹沙集》中。在《古史祛疑》一文中,萧先生

^①萧蓬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对自身文明的童年时代的反思,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崇拜过去而迷信古史和蔑视过去而怀疑古史,曾经是历史研究中交替出现过的两种思潮。科学的古史研究,面临着扬弃泥古派和疑古派的双重任务。由泥古到疑古,再由疑古到科学的释古,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前进螺旋。”^①在这篇文章的后面,署有“初稿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字样,表明从讲课提纲到形成文章用了一年多时间。后来,萧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教材中,又将《朴学简介》与《古史祛疑》两讲的排序加以对调,使《古史祛疑》一讲在先,《朴学简介》一讲在后。从这些变动中,可以直接感受到《古史祛疑》在萧先生思想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萧先生为此所进行的反复思考。

从第二次讲这门课开始,萧先生提出由听课的同学分别整理他的讲授内容,以便为进一步修订补充做准备,同时也给同学们一个专业训练的机会。这样一来,不仅要求同学们在上课时认真听讲、做好笔记,还要求大家在课后进一步查对核实有关文献。当时没有计算机、互联网可以作为文献检索的便利工具,我们只有在图书馆里一本书一本书地查检资料、核对文献,工作量相当大,都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正是通过这种笨办法、慢功夫,使我们开始了解、逐渐熟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在专业学习上得到了很大提高。我当时承接的任务是整理《朴学简介》一讲,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查了很多文献资料才完成的。当时的整理底稿,我至今保留着,成为这一段教学相长的见证。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萧先生对这些整理稿进行了统一修订,交打印社用手摇打字机打印成油印讲义。这些油印讲义是按各讲分别装订的。讲义首页的目录共列有13讲标题:一、引论;二、古史祛疑;三、朴学简介;四、原始文字与古史文献举要;五、周秦之际哲学史料(上);六、周秦之际哲学史料(下);七、秦汉三国哲学史料;八、西晋南北朝哲学史料;九、隋唐五代哲学史料;十、宋元明哲学史料;十一、明清之际哲学史料;十二、近现代哲学史料;十三、中国历代学术史论举要。第十三讲之后,还有结束语。但实际上,打印成为讲义的只是前十一讲的内容,最后两讲和结束语并没有形成讲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研究生院规划出版系列研究生教材,《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被列入首批教材选题。萧先生十分重视此事,集中精力来完成教材书稿。他以这个油印讲义为基础,从文字到内容进行了再度修订,形成了书稿的主体部分。他命我撰写了第十二讲《近现代哲学史料》,形成了书稿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从先秦至20世纪的完整论述。他又将自己的两篇已刊文章——《略论杨泉的〈物理论〉》和《〈推十书〉影印本序》,收入书稿作为附录,旨在为读者提供发掘史料、辨章学术的具体案例。最后,萧先生为教材撰写了《弁言》,回顾了这门课的开设过程,阐明了这部教材的基本特点。他指出:“本书内容如有某些特点,除上述在清理、评介史料中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外,主要还表现在论述中熔铸了较丰富的文史考古知识,并特别注意评介‘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使研究生继踵前修,尽快地进入学术前沿;同时,特别强调义必征实,言必有据,提倡严谨笃实的学风。”^②这些工作完成后,萧先生把完整的书稿送交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部教材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系列教材之一种出版。

在这部教材出版之前,已有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张岱年先生著《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刘建国先生著《中国哲学史史科学概要》先后问世。与之相比,萧先生的这部教材属于晚出,但由于此书是在多次授课的基础上经过反复锤炼而成,融入了萧先生的诸多哲学思考与学术见解,因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和风格,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此,萧先生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从开讲课程到出版教材,一步步艰难走来,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的建设工作。作为见证者,我总以为可以用“功德圆满”四字来评价老师的工作。

1994年的一天,萧先生约我前往他的家中,向我谈了他的安排,让我来接着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他还特意找出一套油印讲义送给我,以便我备课时参考。这一简单而郑重的课程交接,使我深深感受到老师的期望和自己的责任。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主讲这门

①萧蓬父:《古史祛疑》,载《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第101页。

②萧蓬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弁言第1页。

课。而每一次讲授这门课,我总感到自己不仅是面对课堂中的学生,而且也是面对不在课堂中的老师,唯有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讲好课、教好学,才是自己应尽的职份,因为当年萧先生讲课的情景和那一天的课程交接,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萧蓬父先生: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

许苏民

根友兄约我为纪念萧蓬父先生 90 冥诞撰文,促使我重读《吹沙集》三卷。时当炎夏,酷暑肆虐,蛙虫之声盈耳,鸾凤之音罕至。于漫漫长夜中抚读先生遗编,静思先生教诲,不禁百感交集,心往神驰。恍惚中似看到先生燃心为炬的形象(先生喜言丹柯燃心为炬,有“重塑丹柯火样心”的诗句),一个题目——“萧蓬父先生: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蓦然在心中闪现。

论及萧先生的文化自觉,固不自今日始。早在 1986 年我就提出:萧蓬父先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 期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达到的最新水平”(见《青年论坛》1986 年 11 月号上发表的拙文《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开篇)。1983 年以后,先生又发表了许多论著,直到其绝笔之作《〈吹沙三集〉序言》,都坚持、发展和深化了他在“哲学启蒙”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如今重读先生遗著,对先生思想的理解似乎又加深了一些,所以我要说,萧蓬父先生是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先生走了,但其论著还在,故其灵魂不灭。

与海内外普遍流行的观点不同,萧先生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是“人文主义”,而是“伦理主义”;程朱理学不是“人文觉醒”,而是“伦理异化”;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不是程朱理学,而是作为传统与现代之“历史接合点”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启蒙思想在自我反思中前进,不断完善着其对自身基本价值的贞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是儒家的所谓“道统”,而是“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的自我发展和更新。这里有五个关键性的概念,即:伦理主义、伦理异化、历史接合点、启蒙的自我反思、中国文化自我发展和更新的主体性,这五个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都是萧先生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如今的莘莘学子也许会对萧先生的学说感到陌生和诧异,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接受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们除了信奉儒家思想是“人文主义”、程朱理学是“人的觉醒”等说法以外,还天真地相信,秦汉以后社会是钱穆所说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因为非如此则不能与儒家士大夫作为执政者的事实和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事实一致起来;即便不相信钱穆此说者,也相信宋以后 700 年是胡适所说的“理学士大夫捐着‘理’字的大旗争自由的斗争史”。仿佛是宋儒再世,这些年轻人往往“援笔辄效圣贤,开口自任道统”,以代表天地、生民、往圣、万世自许,且自信掌握了绝对真理,自信道成肉身,自信其心一发用就可泽及宇宙万物。他们的“牛”气,简直令我这个常常反思自己、问一声“你以为你是谁”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年轻时也曾“牛”过,但自从 24 岁跟了先生学习以后,就再也“牛”不起来。1976 年早春二月,先生给我讲明清之际史实直至深夜,使我深感自己读书实在太少了;1980 年 5 月先生叫我好好读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使我开始确立“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精神,更深感以往之孤负不可恃。先生强调人是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但不赞成儒者自我崇拜的虚妄,特别赞赏“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洞察、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审视、对人类权利平等的贞定、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等深刻哲理基础之上的,需要好学深思才能体会。我之所以至今对先生的学说信奉不渝,就在于先生教给了我一整套如何做学问的规范和方法,遵循他指明的方法去读书学习,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先生的观点精审而不可易。我想,对于如今某些远比我年轻时要“牛”不知多少倍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们来说,了解一下萧先生